

论现代中国百年文化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张天勇 王 蜜

内容提要 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以唯物史观回望伟大五四运动开创的百年中国文化道路与文化逻辑,具有重大意义。文化是时代的灵魂。文化觉醒是社会觉醒的先决条件,文化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文化现代性是社会现代性的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自觉的伟大历史开端。“五四”以来百年中国文化史的演进逻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的新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次第展开的历史逻辑,它不仅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新现代性的伟大中国文化道路,更以文化现代性引领社会现代性,撬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建设文化强国,必定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前提和重大使命。

关键词 百年文化逻辑 文化现代性 文化强国 社会现代性

伟大的五四运动已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今天,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历史方位上,以唯物史观回望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中国发展史,这一历史不仅表现为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化觉醒史,更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史。五四运动倡导新文化,批判旧文化,以文化觉醒作为社会觉醒的先决条件,以文化变革作为时代变革的先导,以文化现代性作为社会现代性的引领,是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由被动转向主动、由盲目走向自觉、由衰弱走向强盛的伟大转折点,更是开创新现代性的伟大中国道路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文化大变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作为世界最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此,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新文化指导下,中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化逻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的新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次第展开的历史逻辑,这一逻辑的现实展开不仅

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新现代性的伟大中国文化道路,更以文化现代性引领社会现代性,撬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强起来的伟大复兴进程。剖析这一逻辑,深研文化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变革发展的引领作用,对于穿透百年中国文化史,建设文化强国,奋进新时代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主导新文化运动
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五四运动不仅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觉醒史,更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沿着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由弱转强的伟大复兴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对话和论战中胜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马克思主义主导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寻民族独立、救亡图强进程中新旧文化转换的必然结果,是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比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从‘五四’到新时代的百年文化逻辑历史与理论研究”(项目号:19AKS001)的阶段性成果。

较、对话和论争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践选择和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阐明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时代化主线,是准确把握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关键。

然而,百年来,对新文化运动内在的逻辑研究却长期存在着三个误区。一是在新文化主线和本质问题上,片面地将新文化运动等同于整个西方文化大传播的历史,片面强调“五四”期间中西古今文化之争,用以遮蔽和忽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论辩,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强烈影响新文化、最终主导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史是这一文化史主线的事实。二是认为“救亡”“革命”压倒“启蒙”,文化变革作为“敲门砖”在敲开社会变革之门后就被弃置不用,进而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史就仅仅是革命史、救亡史或社会变革史,缺少文化变革史。三是只研究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即仅仅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而忽略文化路径和文化进程;仅仅关注表现为社会现代性的实践变革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忽略作为文化变革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而对五四运动以后百年中国文化变革史有所忽视,更缺乏对于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关系的历史考察和理论研究。三个误区都导致一个结果:遮蔽、忽略了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变革逻辑。这一结果导致我们无法科学理解百年中国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关系中的道路演进规律,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五四运动以来的三个里程碑,即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新文化运动的主线究竟是什么?强调中西文化之争主线论的学者指认一个事实:新文化运动开端于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刊载的文章大多崇尚西方经典现代性文化的观念,如民主、科学、道德。但这一新文化运动进程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而进入新阶段。《新青年》发表了大量宣传十月革命进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思想内容。马

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线,是中国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救亡图强的实践经验中文化觉醒的产物。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强、振兴民族,寻求独立和解放道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是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勇敢尝试。实践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启蒙和洗礼,没有文化变革以刷新国民精神,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和引领,就不可能成功走出旧有的道路。而分析中国现代性之路,必须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才能准确辨析中国社会的结构,明确中国革命实践的力量、目标和路径,才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新文化运动并成为主线和主导,是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比较、对话和论争后所做的郑重选择。在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绝不是在文化真空中进行的,相反,儒释道等原初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新文化传播大潮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都在同台竞争。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文化大论战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思想文化,在中国化传播和应用进程中,其真理性和科学性并非不证自明、自然显现的,而是在与众多思想文化的比较鉴别、对话论争中显现其真理性光辉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因为“救亡”和“革命”而结束,成为一次性的“敲门砖”,而是不断演化与发展,呈现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百年文化变迁史、社会发展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救亡”“革命”与“发展”的现代性道路,恰好是在百年文化史的启蒙、催生和引导下开辟的,文化变革始终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文化现代性始终推动着社会现代性的进程。百年文化史的自觉、自信、自强,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文化条件。新时代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进而实现强起来的时代”^①,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还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五四运动以来,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变革的先导,才有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历史;正是因为有了文化现代性的引领,才能走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正是通过文化路径,才能抵达实践路径;正是率先变革旧文化和创造了中国百年的新文化,才能引导中华民族成功地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百年文化变迁的历史分期

以唯物史观回望由新文化运动开创的百年中国文化逻辑,就是以新文化作为开启新时代的灵魂,以文化变革作为社会变革的先声,以文化现代性作为社会现代性的引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在精神上开启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史的历史逻辑。全面盘点百年中国文化史,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其一,五四运动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大论战时期,即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新文化运动并在中国大传播及初步应用时期。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界,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大传播、大论辩而深刻影响新文化,从而主导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三次大论战”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清道夫”的作用,这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辟场域奠定了基础。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和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初步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从此中国百年文化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的中国新文化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掀起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传播“民主”“科学”理念的新文化运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封建主义展开激烈的批判,其性质虽是维新派、革命派资产阶级立场的延续,但大大提升了对封建主义批判的广度和深度。陈独秀的“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李大钊的“孔子乃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鲁迅犀利深刻的文学作品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示等

等,是这个时代激烈反封建的代表。民主科学观念的传播进一步开启民智。激烈的反封建与对西方民主科学的大力推崇是此时思想界的两个根本指向,全盘否定封建制度及其旧文化,引进西方文化精神来彻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否中崇西”,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立场和思想路径。

新文化运动后期,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越来越怀疑、失望,在继续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关口,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希望,引起了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重大变化,这批人纷纷转变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也使新文化运动走上新的阶段。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革命热情高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一大潮流,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舞台上涌入了一股清流,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当时中国和俄国非常相似的国情,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以西为师”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但也必然遭到各种思想流派的质疑和抵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论战就是这种冲突与对抗的表现,通过大论战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对于社会在更大范围内达成共识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其二,延安时期,即文化自信的初步形成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践路径与文化路径的统一,是实践样态与文化样态的统一。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评了早年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教条主义立场,阐发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的观点,强调要坚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文化立场。提出要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将其看作是提升中国文

化自信的一条正确道路。《新民主主义论》是坚持“中国化”这一根本文化立场的结果,同时确立了这一革命时期的文化纲领,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建立了科学的文化立场,探索出正确的中国道路。

其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过渡时期,即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时期。在批判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梁漱溟新儒学,清除旧中国文化“余毒”中,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实现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

新中国成立初期,内部百废待兴,外部危机重重,在这种大形势下,急需将思想尽快转移到以“一化三改”为中心的新的轨道上来。把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上来,成为全社会团结前进,推进“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根本保障。与之相应,思想文化界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形形色色的旧文化、旧思想,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的东西进行彻底的清理,则成为当务之急。再加上此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在旧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实现新思想的及时转换也是巩固新中国的需要。

对国内外旧思想、旧文化的清理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反动势力,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批判;二是对传统封建文化的批判。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前者突出地体现为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后者突出地体现为对梁漱溟新儒学,特别是对其唯心主义、复古主义文化观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

其四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文革”结束时期,即文化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转向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片面强调红色文化的革命性和唯一性,在文化上否定自己的传统、否定外来文化,强调越纯越好,越“左”越好,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掩盖一切,盲目自信,造成了“文革”的悲剧,文化发展遭遇严重挫折。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发展的“双百方针”,引导当时的文化发展走上正轨。但这种良好的势头很快被极“左”思潮取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文化上极“左”思潮达到顶峰,文

化发展遭到巨大破坏,文化发展氛围被极度扭曲。极“左”思潮是“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集中体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政治挂帅、历史虚无主义等,极“左”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教育根源、心理根源和文化根源,是多方面复合的结果。仅从社会根源上讲,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 年“大跃进”,1959 年“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大跃进”,1963~1966 年的四清运动强化了阶级斗争,助长了极“左”思潮的膨胀,直至“文革”达到顶峰,马克思主义遭遇了严重挫折。

其五 改革开放前期,即外来文化“茫茫九派流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改革开放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社会前沿理论、学派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开展了广泛的对话。与此同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民粹主义思想等也被带入中国。长期封闭的中国,在大门打开的刹那间,各种思想涌入,可以说是“茫茫九派流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发展差距较大,广大民众不能客观地看待这种差距,致使出现了盲目的崇洋媚外,对国外的思想潮流不加区分地盲信盲从,特别是年轻人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的影响和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力弱化,以至于邓小平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这里的十年指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

其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即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促进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时期。既加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上的指导地位,又吸收引进、繁荣发展其他有益文化。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坚持文明对话,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将“四个自信”发展为“四个自信”,突出强调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地位,“建立文化自信,只有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才能有自信的‘底气’”^③。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目标和战略。

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相生相长

百年文化变迁呈现了一个事实:五四运动以后,文化启蒙和变革并没有停滞。相反,中国百年变迁一直呈现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交织发展的状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呈现出一个文化与社会的复线进程。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这一事实,还需要对这一事实所反映出来的内在关联作理论的和逻辑的说明。总的来说,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进程是辩证统一的,是中国道路的一体两面。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来看,百年文化变迁是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相互作用的辩证进程。一方面,文化现代性引领社会现代性的进程,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文化的觉醒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促使我们走上了新现代性的探索之路。在文化现代性保持正确方向时,社会现代性得以有效提升,相反,在文化现代性遭遇挫折,偏离正确轨道时,社会现代性也极有可能走上弯路。另一方面,文化现代性源于社会现代性并由此决定未来的走向,社会现代性为文化现代性提供物质条件、文化素材。

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相生相长的百年史表明:

其一,文化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文化现代性进程引领社会现代性进程。历史表明,“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④。在亡国灭种的关头如此,在“十年浩劫”的灾难时如此,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的严重社会动乱中亦如此。社会发展是由“价值指向”引领的。价值系统是文化的中枢,文化引领社会前进,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发展年代,无论是“站起来”“富起来”还是“强起来”的时期皆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重视文化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引领作用,才能充分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文化自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意义。要改变那种将文化视为“处在社会发展链条末端的被动结果”的错误认识,充分重视文化发展的引领意义。

其二,文化发展是必然的,但不是自然而然

的。社会发展使主体产生新的需求,主体的新需求本身就是价值冲动,价值总是超越现实的存在并引领现实发生改变以接近或达到价值所指的境界,继而产生新的价值冲动,以此“循环往复”,发展永无止境,价值永恒地指向未来。那么,以价值为核心的文化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前进的,文化发展是必然的。但文化的发展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社会发展的被动结果,而是主体自觉地认识、抽象和提升,是自觉的过程,我们要重视文化发展,更加自觉地推动文化发展。

其三,文化发展总是在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和解决矛盾冲突中前进的。文化发展不是哪一种文化的“独唱”,而是多种文化的批判与交融。在文化的发展中,总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先进的、落后的,主流的、辅助的,积极的、反动的,大众的、小众的等等^⑤。文化正是在多种多样的激荡中不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也是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文化、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发展不是一劳永逸地消灭文化矛盾冲突,而是在不同时代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文化矛盾。不同时代存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是主要的文化矛盾;在改革开放初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矛盾是主要文化矛盾。每个时期除了主要矛盾还存在诸多次要文化矛盾,文化发展就是在不断解决文化矛盾中进行的。新时代要善于在处理文化矛盾中促进文化发展。

汇聚支撑强国建设的文化力量

百年变迁,中国从“五四”走进新时代。文化百年变迁的历史梳理与理论分析对新时代文化引领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一,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以引领新时代强国建设,是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自强的百年文化逻辑的根本启示,是文化现代性进程引领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必然结果,是从历史和理论穿透百年中国发展历程的基本启迪。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

繁荣为条件。”^⑥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一个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世界强国,靠硬实力,更靠软实力,靠技术、产品,更靠文化、思想。只有文化强起来,中国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现代化强国,文化强则国强。

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创造时代主体的核心途径。在一群文化落后的人手里,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只能是废铜烂铁。只有强国文化才能塑造适应强国建设的主体,才能在思想上、思维上、眼界上、观念上塑造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现代中国人,有了现代化观念的中国人,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

文化是民族的纽带,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⑦建设强国文化,实现文化自强,才能树立支撑强国建设的文化精神,才能不“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才能“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⑧。

其二,文化的变迁具有阶段性、过程性,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自强,要分阶段、多途径统筹推进。

强国时代的文化建设,要主动回应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时期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向,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要坚持文化发展的“人民中心论”这一根本价值指向;二要根据不同区域空间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分阶段、多途径推进。

强国时代的文化建设,要积极走向世界,在全球文化的激荡中推进。封闭在小池塘里不可能成为世界游泳冠军,强国文化只有在全球文化的比拼中才能建立起来,只有走向世界,汲取世界文化的营养,在与高手的不断过招中才能提高自身的招数,与强敌为伍才能成为强者。真正的强国文化是具有自身特色和相对优势的文化,只有走上世界舞台才能参与全球文化竞争,才能站在时代前沿吸收它国文化之长。真正的强国文化必然是世界文化。要注重文化的世界传播,提升文化软

实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⑨。

强国时代的文化建设,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取各家之长为己所用。百年中国文化变迁的主导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文化,建设文化强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基本立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建设强国文化的根本。要积极吸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能代表当今时代前沿文化的文化,一定是集百家之长的文化。“中国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化立场,中国已步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要走进新时代,走进21世纪,只有站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马克思主义文化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

强国时代的文化建设,要注重内外传播,主动发声、占领阵地。文化的影响力与文化的传播状况息息相关,建设强国文化,要发挥文化引领强国建设的作用。对内,要注重文化大众化,让先进的文化深入群众;要占领网络阵地,以新平台、新渠道传播文化。对外,要积极走向世界交往舞台、多边舞台,要敢于发声,传播中国声音,提升文化影响力。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⑩的教训,逐步提升和掌握国际话语权。在新时代,“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⑪。

其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两创”相统一。要通过“聚焦中国问题”“坚持中国立场”“凝聚中国视域”“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等四个环节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自强。

百年文化发展逻辑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立场的历史变迁。文化立场的选择是根本选择,文化立场选择决定中国现代性道路的命运。无论是“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还是泥古不化的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文化原教旨主义,或是文化新自由

主义、后现代主义、民粹主义等等的文化立场,都必然导致中国文化道路选择的偏颇,进而导致中国革命和发展的现代性事业的失败。在新时代,习近平强调大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上的指导地位,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化”的文化立场,坚持对传统文化实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文化立场,正确开辟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的道路。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从“五四”到“新时代”的百年文化逻辑是中国发展的“文化脊梁”,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文化路径。历史照亮未来,坚定这条大道,走好这条大道,新时代的步伐才会更加坚实。

- ①韩庆祥《论习近平新时代观》,《阅江学刊》2019年第2期。
-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 ③赵义良《文化自信的中国表达》,《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
- ④⑥⑦⑧⑨⑩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3~4、13、10、198、211、208页。
- ⑤参见郝正《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天勇,1976年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蜜,1987年生,文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冯 潇)

《析津志·名宦》条勘误四则

都刘平

元熊梦祥《析津志》原书已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佚本中《名宦·杨采亭》条载“杨采亭,玉田人,号慵斋,字春卿。中统建元(1260)之初,辟卫辉劝农抚使,道不行,谢去。至元四年(1267)起兴文署丞校讎。得疾,卒于家,年六十四。先生仕我朝,官至奉训大夫、集贤待制,终于蓟州知州。子名述祖,字孝达,号泾溪。循理博学,能诗,今居蓟州。”(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又《名宦·杨朝舜》条“即采亭之父也。”(第145页)

上引《析津志》的记载有四处错误。(一)“采亭”不是杨春卿的号,而是杨遇(字朝舜)的号。王旭《兰轩集》卷四《送张无咎赴济南教授兼简杨朝舜二首》其一,注尾联“况有采亭青眼在,笑谈真足慰离愁”云“采亭,杨之号也。”(二)将杨春卿与杨朝舜的父子关系颠倒了(详第三条)。(三)杨春卿仅一子,名遇,字朝舜。杨述祖非杨春卿之子。魏初《青崖集》卷五《庸斋先生哀挽诗引》:“一子遇,今在史馆。”魏初自言“十有五从先生学,知先生莫初详也”,《哀挽诗引》是杨春卿“亡有年”,受其子杨遇之请

而作,不当有误。另刘因、刘敏中二人的记载亦为参证。刘因《静修集》卷二四《玉田杨先生哀辞并序》:“至元丙子,其子遇始与予会。”“遇,今为史院编修官。”刘敏中《中庵集》卷五《书杨庸斋挽章后四首》其四注“先生之子朝舜,名遇,字画诗,文皆佳,名动一时,时为济南路判官。”(《四库全书》本)(四)所记杨春卿历任官职有误。魏初《庸斋先生哀挽诗引》述杨氏历官“先生尝奉命提举河间常平事,后改卫辉劝农,未几辞去,朝廷复授兴文署丞。”提举河间常平仓事,在蒙哥壬子年(1252),见《元史》卷一三四《月合乃传》。卫辉路劝农官,有王恽《挽杨春卿先生》诗可证,诗题注云“曾为卫辉路劝农官。”(《四库全书》本《秋涧集》卷一七)兴文署丞,见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七《兴文署·事故》条。同时人文献中不见有杨春卿官“集贤待制,终于蓟州知州”的记载,疑是误认杨朝舜所任官职为杨春卿。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